

生态系统转换下我国社会工作的位势变化与新本土化发展

王思斌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本文以生态系统的理论视角分析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认为在民政部门的主管推动下,我国的社会工作事业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发展不平衡,社会工作的发展呈弱生态系统状态。《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建立中央社会工作部,统筹指导全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生态系统向强生态系统转换,并呈现一系列基本特征。生态系统的转换,会提高社会工作的生态位,获得新生态机会。要坚持党的领导,在专业社会工作新本土化与本土社会工作创新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我国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发展”。

[关键词]社会工作;生态系统转换;新本土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4)01-0078-08

我国社会工作是在一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和具体环境下,为了应对具体的社会问题而发展和发挥作用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及党的社会工作系统的建立,使我国社会工作进入新的生态系统,并将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更大作用。本文试图阐明在新生态系统下,社会工作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新本土化”的思路。本文之社会工作是指我国的社会工作事业,也是指某一领域社会工作的发展,而不是某项具体的社会工作服务。

一、生态系统及其与社会工作的关系

在国际上,社会工作是在一定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福利制度下,传送社会服务和促进社会秩序的专业活动,它的发展受到其所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的重要影响,受到具体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也受到与其直接相关的社会组织、具体社会环境以及服务对象状况的影响。可以说,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和服务的实施是处于复杂的系统之中的。如果我们把社会工作的生存、发展和发挥作用置于生态系统下来考察,可以说,社会工作是处于一定的生态系统之中的,它本身也构成某种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的特征会影响社会工作的发展和作用发挥。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决定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并在省、市、县级党委组建社会工作部门。党的社会工作部门将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以及承担拟订社会工作政策等职责。这是对党的社会工作的职能和组织体系框架的定位,具有鲜明党的工作的特点。

在这之前,民政部是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行政主管部门,现在变为由中央社会工作部统筹和推

[作者简介]王思斌(1949—),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工作。

动社会工作发展。这不但使社会工作的内涵得到扩展,社会工作的任务和功能增加,而且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统筹权、管辖权发生变化,社会工作事业发展和发挥作用的机制也将发生变化。对于社会工作事业发展来说,这是其生态系统的转换。下面,本文从生态系统的生态位势、生态能力等角度,对上述转换下社会工作的发展前景尝试地做一些分析。

生态系统是由生物生态学和系统理论的集合发展而来的,它是一种看待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生物生态学关注生物之间的竞争和共生关系,形成了食物链、种群、群落、成长和消亡以及生态位等概念。后来,生态学理论在诸多方面得到发展,出现了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环境生态学,人类不同群体关系的人类生态学,以及人类不同组织、不同群体之间相互依存及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态学、组织生态学等等。

社会生态学是研究动物和人类的社会组织及社会行为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芝加哥学派将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运用于人类社会问题研究,形成诸如社会位置、情境、符号互动等一系列概念,探究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共生逻辑。后来的芝加哥学派学者还研究关联生态问题^①。将生态学的理论运用于城市研究,就产生了城市生态学(人文区位学),它比较强调区位概念和区位理论。区位理论关注人们居住、工作和生活的地理位置、社会关系和社会空间,以及政治权力和经济机会的分配。列斐伏尔等人的空间社会学理论^②实际上也与生态学有一定关系。生态理论还被运用于组织研究,形成组织个体生态学、组织种群生态学、组织群落生态学和组织生态系统生态学等不同层次^③。

实际上,区位和生态位的概念在分析人类共同生活时有十分相似的含义。它们指的都是某一个体或群体在一定生态系统中的地位,这种地位与其他个体或群体有关,从而具有了社会地位、生存空间和活动空间、相互关系中的优势或劣势等位势含义,生态位或区位的变化可能意味着该主体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变化。

社会科学中的系统理论也与生物学的生态理论有一定联系。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把整个社会、各种制度、文化和人格都看成系统,它们都由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并整合成为一个功能整体。帕森斯在分析社区的结构时也指出,社会系统的所有个体行动者都是居于其他事物之中的物质有机体^④。霍利的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系统的变化更多地来自于环境系统,而不是整体内部组织的过程^⑤。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指出了现代社会中系统的开放性和动态性,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系统的认识。

社会工作在其发展中也吸收了生态学和系统理论的成果,社会工作生态社会系统模式强调人在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中,社会工作就是要谋求环境中社会结构的改变,在这里,生态—社会被看作是一种视角^⑥。实际上,从社会工作的“人在情境中”到“人在环境中”的视角演进,很容易推演出“社会工作在环境中”的看法。生态系统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对社会工作影响巨大,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的“人在环境中”的视角的扩展和延伸意味着把不同的生态系统看作一个连续统一体^⑦。

运用生态学理论和视角,分析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一些学者做出过努力,也富有启发^⑧。当前,党和国家机构系统化改革的框架已经成为社会工作运作和发展的重要制度环境,借用社会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可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将“人”与“情境”对立起来的做法^⑨,更清楚地理解我国

①[美]安德鲁·阿伯特《过程社会学》,周忆粟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40页。

②[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③[美]迈克尔·汉南,[美]约翰·弗里曼《组织生态学》,彭璧玉、李熙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④[美]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梁向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218页。

⑤[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张茂元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80-81页。

⑥童敏《社会工作理论:历史环境下社会服务实践者的声音和智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70页。

⑦赵一红主编《生态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07页。

⑧这里包括:闫磊《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径——生态系统理论下的维度分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赵一红主编《生态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等。

⑨童敏、周晓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社会工作理论转型》,《社会工作》2023年第1期。

社会工作事业进一步发展的路径。本文将社会生态学作为研究的基本视角,而非用其概念体系和理论逻辑去图解我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希望有所启发。

二、生态位势和生态机会—生态系统转换对社会工作发挥作用和发展的影响

在生态系统理论中,生态位是一个基本概念。按照最早使用生态位术语的学者格林内尔(Grinnel)的说法,生态位是“每个物种由自身结构上的和功能上的限制被约束在其内的最后分布单位”。在社会生态学研究,生态位是指某参与者以其资源和能力与其他参与者相互作用所处的一个位置。生态位代表了该参与者对于其他参与者的重要程度,也代表着其对整个系统的影响力。在生态系统中,生态位就是占有者的生态位势,或该生态位及其状态所具有的势能。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位势被解释为地位和权势,这与生态学上的含义基本相同。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居于中心位置者,其生态位高、生态位势强;反之,其生态位低,生态位势弱。实际上,某一参与者的生态位是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对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性的反映。具有较强和支配型资源的参与者占据较强的甚至中心位置,拥有较弱资源者则处于边缘地位,即占有较弱的生态位,他们各有自己的生态位势。强生态位与弱生态位之间依靠不平衡的相互依赖关系共生于同一系统中。当然,某一参与者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即生态位势并不是完全固定的,由于他们在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他们的生态位可能会有所变化。一般地,在一个具有竞争性的生态系统中,参与者都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态位。于是,参与者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改变(主要是提高)自己的生态位,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为此,我们尝试地引入生态机会的概念。

关于生态机会,在生态学理论中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概念,至少还没有形成核心概念。近些年来,由于网络经济、信息传输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些产业界人士在使用相近的概念。如有人指出中国数字经济正迎来“生态级”发展机会,腾讯创始人提到“百度也看到移动生态的机会”,光大证券提出要重视鸿蒙的生态机会(引自百度网络)。这里的“生态级发展机会”“生态机会”指的是新产业形态在形成过程中,参与者们可能在新业态(也是新生态系统)中的可能地位,要占据更有力的位置(生态位),以赢得市场主动。在社会学理论中,特别是在具有竞争性的社会系统中,“机会”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比如,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向度,都是用“机会”来表述的。“机会”代表了一种可能性,一种基于自己实力的、实现自己愿望的可能性。可以认为,生态机会是指行动者(参与者)基于自己的资源禀赋和努力在系统中占据的相对地位和在一定时空下实现自己目的的可能性。

系统参与者的生态位和生态机会可以是变化的。由于系统内部关系(结构)的变化,通过自己的努力,参与者有使自己的生态位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或者由于更大系统的变化,使行动者在新的系统中获得新生态位而发挥自己的功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上述产业界在网络经济、数字经济兴起中,抢占新位置的想法,表达的就是这种生态机会。事实上,当行动者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系统时,他就会获得新生态位,也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生态机会。

在社会工作领域也是如此。社会工作教育机构、实务机构,社会工作行政主管部门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努力,是处于这样或那样的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并受这些系统特征的重要影响。我国实行的是党政主导、社会运作、公众参与的社会工作服务与管理格局。在这种格局中,党政部门在社会工作发展方向、服务领域开放、服务经费提供上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工作机构通过申请项目、组织资源为服务对象开展服务,并做多方交代;社会公众通过反映需求、配合服务,以及作为志愿者支持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这里就形成各方都作为复数的、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也会形成某种社会生态系统。

从参与主体的角度看,政府部门有生产服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部门、服务使用部门和财政资源使用的监督和服务效果评价部门等,各部门又形成自上而下的纵向系统。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的社会服务提供者(社会服务机构)与各种服务使用者也会形成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生态系统,依据自身的资源和对系统运行的影响力,就会形成某种生态结构。如果开展服务的经济资源(经费)是关键性的,

那么,政府就处于生态系统的中心位置,而不同层级、不同职能的政府部门会有不同的生态位;如果看重的服务创新和效果,社会服务机构的地位就更加重要,机构的专业能力会把不同机构分出层次,社会需要的、具有更强专业能力的机构会占据更有利的生态位。那些比较了解社会工作的专业特征且想为民做事的政府官员,会对社会工作机构提出合理要求,专业性较强的社会工作机构会得到政府的信任和较大的专业服务创新空间,社会工作机构的生存环境和工作环境就较好,社会工作也较容易取得成绩,得到政府和社区民众的认可,而这些又会使社会工作机构进行社会资本再生产,进而强化和提升自己的生态位。

当然,我们也会发现由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资源降低,而使社会工作机构地位变差的情况。某一地区主管和支持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负责人调换,新负责人的政绩关注点转移,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经费减少,都会影响社会工作机构的生存和工作。

三、我国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社会生态学

我国的专业社会工作重建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首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产物。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九十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大规模地准备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经过多方论证和讨论,1987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在社会学学科下试办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民政部也积极发展本系统的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发展初期的任务主要是学科建设和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教育部主管社会工作专业设置和推进课程体系建设,民政部主导组建了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推进境内外学术交流,探索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方向。这一阶段社会工作生态系统主要由民政部门 and 民政系统、教育部门、高等学校的社会工作教育群体、部分城市社区居委会及居民构成。社会工作处于起步状态,工作范围窄、社会影响小,相关各方联系弱,功能有限,属于弱生态系统。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但也带来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失序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并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把加强社会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并就队伍建设及其发挥作用的途径做了战略部署。接下来,中央18部委(群团组织)、19部委(群团组织)相继联合发布促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文件,并开始建构党政主导、社会运作、公众参与的社会工作服务和管理格局,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工作生态系统。

经过几年运行,这个社会生态系统显示出如下一些特点:第一,党政主导。上述18部委(群团组织)、19部委(群团组织)联合发布的文件是经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审议通过的,具有很强的政治合法性。各政府部门都表示积极参与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规模大、涉及面广。另外,支撑社会工作运行的经济资源和发展空间也由党政掌握。第二,主管部门大力推动。19部委(群团组织)联合发布的文件由中央组织部牵头,民政部是主要责任部门。该文件实施之初,中央组织部和民政部统筹了发动工作,之后的推动工作主要由民政部负责。中央组织部权威高,推动初期声势大。具体工作由民政部推动,其权威较低,社会工作发展的生态系统模糊。第三,部门和地区发展不均衡。虽然19部委(群团组织)共同签署了发展社会工作的文件,但是各参与方推进本系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力度却大不相同。比较起来,民政部作为主管部门推动力度较大,专门出台文件在本系统发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并推进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发展。有些部门在落实该文件时小有举动,也有不少部门对之置若罔闻。可以看到,政策发布的层级,牵头部委的权威性影响着一些政府部门是否要在本系统兑现自己承诺。19部委(群团组织)文件制定和推进的某深度参与者曾深刻地指出,如果这个文件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发布,效果会大不一样。民政部门被认为是弱势部门,协同其他部门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能力不足,也影响着社会工作在其他领域的发展。第四,主管部门与社会工作教育群体密切配合推进。社会工作教育群体基于对专业发展的高度认同,积极配合民政部门工作。民政部门认为社会工作教育群体是不可多得的专业力量,于是,二者结成了比较稳定的联盟,成为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力量,也

使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呈现“教育先行”的特点。但是从推动整个社会工作发展的角度看,二者协同合作的力量偏弱,在宏观系统中生态位不高,没能带动起社会工作在更多领域的应有发展。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到,党中央决定发展社会工作,在中央组织部的主导下,各相关部门形成较松散的社会工作发展系统,社会工作有了一定生态机会。但是,由于缺乏具有较高权威的中央部门的领导和持续推动,所以没有形成密切关联、相互促进、竞争合作的社会生态系统。该系统的生态能力不足,也就难以实现预期效果。

至于民政部门与社会工作教育界、实务界在人才队伍建设、服务弱势群体、参与脱贫攻坚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合作,由于民政部门具有行政权威、占有经济资源,教育界与实务界对发展社会工作高度认同,于是就形成以民政部门为中心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民政部门处于领导和中心地位,社会工作教育群体和实务群体以其专业能力处于重要但相对依赖的地位。民政部门给予教育群体、实务群体一定的专业实践权,并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尽可能的支持,使教育群体和实务群体获得一定的生态机会,并通过专业服务展现了自己的专业能力,协助民政部门解决其有责任处理的社会问题。于是,三方就形成关系较顺畅的生态系统。这个功能性生态系统或者整体性地展示自己响应中央号召服务社会的能力,或者合作开辟新的服务领域。遗憾的是,这个生态系统没能在宏观的经济政治系统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获得较好的生态机会,未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于是,我国的社会工作处于积极开拓、但发展不平衡的状态。

由此我们发现,影响我国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政治或行政权力,以及受其制约的经济资源。系统中这些因素的强弱决定着促进社会工作发展的生态系统的强弱。没有强有力部门作为生态中心,缺乏中心与次级生态位占有者之间的利益关联,整个生态系统就比较松散,难以有效发挥整体功能。

四、党的社会工作系统的建立及社会工作发展的生态系统转换

我国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并在各级党委组建社会工作部门,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统筹、指导社会工作发展的系统,使党的社会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框架,也会形成新的社会工作发展的生态系统。党的十九大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并建立覆盖全国的组织系统,是落实党的二十大对今后5年乃至更长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部署的重要措施,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加强党中央对社会建设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重大举措。

从由民政部作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行政主管部门到成立中央社会工作部统筹、指导和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在统筹和管理层次上是一个重大提升,在社会工作的功能范围上也是新的扩展。《方案》关于中央社会工作部的职能范围指出,党的社会工作涉及人民信访工作,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工作,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工作。这反映了党的社会工作范围的扩展,即加强党在人民信访、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领域的工作。从党的社会工作是在社会领域,组织动员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凝聚与社会整合的角度看^①,《方案》阐明的党的社会工作也是对原来的、以帮助弱势群体解决民生问题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工作的拓展。

另外,由中央社会工作部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进行指导,拟订社会工作政策,是对发展社会工作的重视程度的明显提高,也是对社会工作生态系统地位和生态能力的提升。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学科专业的方向发展的,它以专业性提升为特征。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社会工作人员专业水平的提升,是在少数政府部门的主导下发展的^②,没能形成具有较

^①施俊主编《党的社会工作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王思斌、阮曾媛琪、史柏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2页。

强统合力、协同推动发展的社会系统。由于职业管辖权^①等方面的原因,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未能有效发挥,社会工作促进社会建设的功能发挥有限。现在,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党的社会工作部门统筹、指导社会工作发展,政治位势高、行政权威大、发展视野宽、统筹能力强,通过统筹、指导、督促和评价等手段,可以将党政部门、群团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社会工作各相关部门也会尊重党的社会工作部门的权威,认真发展本系统的社会工作,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促进本部门主责主业的发展。这样,就会形成新的、以党的专职部门为统领、促进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生态系统。这是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动力系统的转换,是从原来的较低层级、较弱能力的推动系统向较高层级、较强能力的推动系统的跃迁。

新的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建立,提高了社会工作的生态位,会增强社会工作的生态能力。仅就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而言,由民政部推动其他签约部门发展社会工作,有时好像是民政部门有求于对方。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后,原来属于民政部的主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部门转隶过来,该部门就会以党的工作部门的身份,向其他有发展社会工作责任的政府部门、群团组织提出要求,制定相关政策,在整体上推进社会工作发展。明显地,主管部门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生态位势在提高,生态能力在增强。

党的社会工作系统的建立和职能的有效承担,可以在总体上推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通过生态系统内的合作、协同、竞争等机制,可以推动社会工作生态系统质量的提高,并可以在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增进民生福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更明显地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进而提高社会工作在社会建设领域的生态位,正向激励社会工作的新发展。由此看来,这种生态系统的转换对于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意义。

还有另一个方面需要阐明,即党的社会工作范围的拓展,将会使我国的社会工作呈现扩散性、专业性、本土性特征。以往的社会工作主要聚焦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其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可以说,过往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是中央社会工作部及其系统建设的重要基础。但是,只着力于专业社会工作也有其弱点,这就是一些政府部门、群团组织觉得专业社会工作与他们的主责主业关系不大,从而不积极、不主动。这也使得社会上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氛围不够浓厚,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认知程度偏低。党的社会工作不限于专业社会工作,职能也不只是对弱势群体服务,这会我国社会工作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层面更加多元、方法更加多样,从而使我国的社会工作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在更加广阔的社会工作领域,不同的社会工作方法互相借鉴、共同提高,能更好地服务于民生、助力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建设,贡献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可以归纳社会工作发展的生态系统转换的基本特征:第一,政治生态地位提高。发展社会工作的主管部门从政府部门转为党的部门,统筹推进社会工作发展者的政治地位提高,社会工作的发展在更高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提高;第二,系统性增强。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被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党和国家机构职能实现系统性、整体性重构的大背景下,社会工作发展的系统性增强;第三,系统内联增强。中央社会工作部及其系统的建立,确立了党的部门在系统中的生态中心地位,进而可以增强其与系统内政府部门、群众组织等相关方面的联系,生态系统能力增强;第四,生态系统功能扩展。社会工作的发展由主要关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变为统筹指导整个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主管范围扩大、生态系统功能扩展;第五,系统统筹领域扩大。党的社会工作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人民来访,主动了解人民需求,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扩大了社会工作的实施空间。加强社会领域的党建,也会增强社会工作发展的基础;第六,系统能力增强。由于社会工作事业发展主管部门的政治生态地位提高,与相关部门的关系也会由引导式合作向督促评价式协同发展,统筹推进手段多元,使得生态系统的功能增强。由此我们可以说,从原来的由民政部推动变为由中央社会工作部及其系统统筹推进,是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生态系统的重大转换。

^①[美]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梁向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217页;[美]安德鲁·阿伯特《过程社会学》,周忆粟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57页。

生态系统的转换,使社会工作有了更宽阔的实施领域,有了更宽厚的行政和社会基础,社会知晓度更高,社会工作发展的生态系统更大,社会工作事业的功能地位和发展位势也会因此而继续提高,这有利于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

五、生态系统转换下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发展”

(一) 从加强党的领导的角度看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中央成立社会工作部并建立党的社会工作系统,是社会工作领域生态格局的结构性、制度性变化。社会工作发展的新生态格局形成,会带来新的生态机会,要抓住有利于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新机会,促进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

如上所述,对于社会工作事业来说,《方案》的实施,最大的变化是执政党对发展社会工作事业的直接领导。在我国,党的领导和具体指导,是促使经济社会领域发生变化和实现发展的关键。中央社会工作部的建立和党的社会工作系统的形成,将会准确地确定自己的职能定位,强化党对社会工作事业的领导,进一步确立社会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政治方向,使社会工作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党的社会工作系统做好主责主业,会更直接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

在这之前,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是“教育先行”,主要集中于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工作的核心。但是,由于社会工作的生态系统弱,再加上时间等原因,社会工作的发展与党和政府对发展社会工作的目标期望相比还有距离。中央19部委(群团组织)联合发布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在论述发展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时指出,要像高度重视选拔培养经济建设人才那样,高度重视选拔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同时指出,社会工作主要服务领域是对困弱群体服务和助力社会管理的某些方面。在强调“突出重点、统筹推进”的原则时,指出要以城乡基层为重点,并通过重点突破、以点带面,使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由重点领域向一般领域推进,社会工作受益对象由特定人群向普通大众拓展,统筹推进各方面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现在,在党的专职部门的统筹、指导下,有过去十多年发展形成的基础,党和国家发展社会工作的目标就更易于实现。这里不但包括在属于党的社会工作部门的职能领域发展社会工作,也包括在先前已经得到一定发展的领域进一步做好工作,还包括在诸如乡村振兴等一些新领域推进社会工作的发展。

(二) 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发展”

按照《方案》,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社会工作职能,既包括党在社会领域了解群众需求、组织动员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的工作,也包括进一步推进我国过去多年得到一定发展的专业取向的社会工作。工作领域扩大了,工作任务更加复杂了,工作要求提高了,就需要社会工作的发展更适应国情,更接地气,能更好地解决民生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方面的问题,要研究新的发展策略,本文将之称为谋求“新本土化发展”。

党的二十大召开以后,根据党在新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任务,笔者针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曾提出“新本土化”概念,意思是我国的专业社会工作要在“初步本土化”的基础上,进行“新本土化”。所谓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是要在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和基本理念指导下,在我国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实施中,综合和灵活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吸收本土经验,有效解决基本民生问题的过程,并指出了“新本土化”的几个基本领域^①。现在,从《方案》关于中央社会工作部的职能定位和新生态系统的角度看,需要对“新本土化”做再理解。

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个基本判断也适用于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即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既要借鉴国际有益经验,更要重视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这个思路超

^①王思斌《中国式现代化新进程与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社会工作》2023年第1期。

越了以专业社会工作为底板的思维,而是着眼我国实践着的、更加宽广的社会工作,于是也需要从更宽的角度理解“新本土化”。笔者认为,对“新本土化”的再理解,不是要改变这一概念的基本内容,而是要对内容结构做适当调整。具体地说,即不是只从专业社会工作的视角出发,而是要加强党的领导,从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经验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角度,看待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发展。从概念上来说,就是把原概念解释中的“吸收本土经验”改为“结合本土经验”。“吸收”与“结合”的区别在于主体性的差别,“吸收”以专业社会工作为主要方面,“结合”则是相互的、平等的。这样,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发展”就可以表述为:在党的领导下,遵循社会工作价值观,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实施中,综合和灵活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结合本土经验,有效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加强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建设的过程。这种解释,强调党对社会工作事业的领导,是基于基本国情;强调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与本土经验的“结合”,更符合我国当下社会工作的总体实践,也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工作事业的新发展,同时也表现了我国社会工作在新条件下的专业自觉、国情自觉和实践自觉。

在对“新本土化”做再理解时,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即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和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关系问题。在我国社会工作界,“本土化”一般是针对外来的社会工作而言的。既然如此,那么,本土社会工作实践有新本土化的任务么?笔者的观点是肯定的。因为从近些年来我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实践来看,无论是社区工作还是群众工作,都在寻求方法创新,具体地表现为对本土化了的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的某种程度的借鉴和运用。这种借鉴和运用对改进社区工作、群众工作有一定推动作用,但是不少实际工作者也反映,一些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与社区工作、群众工作还不能很好地结合,甚至出现“两张皮”现象。于是,在提高社区工作、群众工作的专业性上,需要更贴近实际,借鉴、学习、运用新本土化了的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由于专业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是以进一步适应国情、解决实际问题为本的,那么,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在与专业社会工作的结合中,进一步增强自己的专业性,也就有了“新本土化”的部分内涵。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发展,是依据国情,在增强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提升社会工作生态系统的专业特质的意义上加以强调的。当然,这种“新本土化发展”绝不意味着忽视本土经验,而是要大力总结和提炼本土经验,使之更具专业性。要在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和提炼本土经验并使之有机整合的基础上,提升社会工作系统的整体能力,保持社会工作的高生态位,创新我国的社会工作,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实现党中央确定的发展社会工作,提供专业服务,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

六、结 语

本研究借鉴生态系统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的基本思维,对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以来,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认为中央社会工作部及其工作系统的建立和发挥作用,是我国社会工作生态系统由弱到强的重要转换。这种转换提高了社会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生态位,也带来了新的生态机会,社会工作系统应该提升和用好自己的生态能力,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相结合为基础,增强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实现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发展”。本文没有回应国际上关于社会生态系统的观点,但是,依据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生态系统的发展和转换过程的实践,从纵横交织的综合生态系统的角度进行分析,对已有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进行新知识的补充是可能的,笔者也愿意另做尝试。希望本文所论能在我国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生态系统转换和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韩小凤]

Main Abstracts

Profoundly grasping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Xin Xiangyang 5

Building a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we want to build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This is a creative and vibrant civilization and there is no era like today wher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so full of vitality. This is a democratic civilization with fully protected rights. The Chinese nation completed a great leap from thousands of years of feudal autocracy to people's democracy wh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Today, the democratic rights of the people are fully protected. The socialist national system and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great cre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 The daily civilization of achieving a better life is reflected in all aspects of daily life and various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protected and realized.

The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discourses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Yu Zuhua Wang Jianghui 12

Proposed respect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two related and different concept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re both originated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ving their relatively independent processes of brewing, generat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two discourses are "separate". Generally presented in the context of appearance-exit-restart, the concep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as put forward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and was written into the report of the Party Congress for more than 40 years until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term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ppeared in newspapers in the early 1980s and was quickly included in the report of the 13th National Congress, rising to become a frequently used popular term. The "integr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four coupling" betwee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ing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the general task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new journey of the CPC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key lies in the party" to realize the great dream.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integrating the previous discourse of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four modernizations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stand up, get rich and become strong").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digital economy empowering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under dual goals

Ren Baoping 41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empowering agriculture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with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dual goal, which is to achieve both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o modern agriculture and the digitization of agriculture. Under the dual goals,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em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t the macro, medium and micro levels.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the digital economy empower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clude innovation driven mechanisms, efficiency improvement mechanisms,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mechanisms, supply and demand structure mechanisms and financing support mechanisms. The key task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dual goal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is mainly to improve the supply guarantee level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grain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supply, to optimiz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ructure and regional layout, enhance agricultural quality, efficiency and competitivenes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and enhance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supply chain,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forms of moderate scale operations, and to improve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promot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response to the constraints of digital economy empowering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 path of digital economy empowering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under dual goals lies in promoting the digitization of the entir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and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making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rural digital economy and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mproving the support system and enhance the support capacity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o empower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support and broaden financing channels for empowering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niche change and new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under ecosystem transformation

Wang Sibin 78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system theory. It argues that under the leadership and promotion of the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 the social work in China has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is unbalanced and presents a relatively weak ecosystem state. The *Reform plan for Party and state institutions* decided to establish the Social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its sys-

tem to coordinate and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wide. The eco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has then transformed into a stronger one with a series of basic characteristics. The ecosystems transformation will improve the ecological niche of social work to gain new ecological opportun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realize the "new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combining the new localization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with local social work innovation.

Reinterpretation of Lu Xun's novel *The True Story of Ah Q*

Zhang Bocun 95

Based on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agonist Ah Q and his environment, this paper identifies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s in the narrative and divides the entire novel into four types: metaphor, metonymy, synecdoche and irony. From the first part as a metaphor for national character, *The True Story of Ah Q* shifts and restores to the metonymy of survival on the bottom line of "food and sex", and then elevates it to the synecdoche of revolutionary themes in a broad and grand sense, ultimately it transforms into Lu Xun's iron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 China. These four narrative shifts and language form paradigm represent Lu Xun's transition from the consciousness of metaphor through the ones of metonymy and synecdoche to the stage of self-awareness represented by iron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ck of coding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vel plot and the author's cognitive type is external and internal.

On the purpose of interpretation: One of the fundamental issues in Chinese literary hermeneutics

Li Chunqing 115

Only humans can interpret because only humans live in a world of meaning, and meaning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language and interpretation. So why do people need to interpret? Traditional hermeneutics mostly believes that interpretation is to discover the author's intention, while modern hermeneutics believes that interpretation is a way of human existence. This is obviously not discussing the issue on the same level. However, both of these hermeneutics have a common point, which is that they do not attach much importance to the important, even decisive significance of the "purpose of interpretation" for the act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e entire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Traditional hermeneutics focuses on the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of the interpreter rather than the impact of the interpretive purpose on the interpretive behavior, while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interpreter's foresight (prejudice) in the act of interpretation, but also ignor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urpose of interpretation. In fact, when facing the object of interpretation, the interpreter always approaches and discovers the meaning of a certain level from a certain perspective, and no one can fully understand the object of interpretation. The reason why the interpreter chooses this rather than that perspective to approach is certainly influenced by their foresight (prejudice), but it is also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purpose of the interpretation. Foresight (prejudice) and the purpose of interpretation, one overt and one covert, jointly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and outcome of the interpretation process.

From "capitalist system" to "semi colonial and semi feudal":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Li Yong 143

The Chinese Marxism historians hold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e social nature of modern China, such as "capital system", "colonization", "semi-colony", "semi-colony and semi-feudal",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y". The theory of "capital system" is similar to the Trotskyist viewpoint and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for a long time. The theory of "colonization" is a universal term. The term "semi colony" is a universal term.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 order of "semi colonial" and "semi feudal" represents people'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strength and influence of foreign imperialism and domestic feudal forces. The internal disagreements withi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have led to the ambiguity and divergence of opinions amo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sulting in diverse opinions among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feudalism logically require a match with the "semi colonial and semi feudal" theory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In view of this,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 gradually converged with the "semi colonial and semi feudal" theory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 especially after Mao Zedong published his *On New Democratic*.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advocates of "semi colonial" and "semi feudal semi colonial", reflecting the academic magnanimity of the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camp under the premise of "anti imperialism and anti feudalism".

Xunzi's study of gentle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 theory of the human being

Tu Keguo 165

Xunzi elaborated on a series of issues such as the connotation, composition, form, characteristics, representation, status, criteria, realm, emotion and effort of a gentleman. Xunzi proposed two core concepts, the study of gentlemen and the way of gentlemen, which permeated his thoughts and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ed the study of gentlemen. In terms of the essence of a gentleman, the meaning of a gentleman in Xunzi's words includes three aspects. As a versatile and knowledgeable gentleman, a gentleman with a certain status, and a gentleman with noble morality. In terms of the moral character of a gentleman, Xunzi mainly endows gentleman with five connotations: advocating justice, fairness, loving others, moderation and sincerity. In terms of the value pursuit of gentlemen, Xunzi highlights the moral value pursuit of gentlemen with goodness as a symbol, and strongly advocates for gentlemen to uphold the Tao, accumulate goodness, and argue. In terms of the status and role of a gentleman, Xunzi roughly explains it from two aspects: the gentleman governing various things and the gentleman managing heaven and earth. In terms of the self-cultivation of a gentleman, Xunzi focused on elucidating two cultivation methods: learning and self-cultivation.